

新
季
叢書71

國際關係的

政治經濟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羅伯特·吉爾平——著

Robert Gilpin

楊宇光等——譯

蕭羨——校閱



國際關係的 政治經濟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羅伯特·吉爾平一著

Robert Gilpin

楊宇光等一譯

蕭蕤——校閱

序言

本書既是我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家之言，也是我對該領域反覆探討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課題的綜述。雖然我努力把自己的見解和綜述內容區分開來，但在選擇某些國際政治經濟學問題直抒己見的同時，我也吸收了其他學者的思想和理論，因為它們和拙著所討論的內容密切相關。當然，僅此一書無法概括所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論著，但我盡可能將那些重要或具代表性的論點歸納進來，相信它們有助於闡明一些關鍵性理論問題，並加深我們對當代國際政治經濟現狀的認識。

我對這些論題的興趣萌發於為一九七〇年六月在哈佛大學國際問題中心舉辦的研討會進行籌備工作之時。會上發表的論文後經羅伯特·基奧恩(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編輯整理成為《跨國關係與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1972)一書。那本書轉移了美國國際關係學派的研究方向，並改變我個人的研究主題。

那次研究會以及《跨國關係與世界政治》一書的基本主題是，跨國行動的主體與進程正朝向全球整合化的方向發展，並逐步取代國際關係乃至國內關係中以國家為中心的觀念。據信，跨國行動主體(如跨國公司和政治運動)、福利等國內目標以及非軍事力量，在決定世界事務方面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開創國際關係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已勢在必行。

在撰寫有關跨國公司在創造新的國際環境所扮演的角色的章節時，我心中反覆回味著我在法國居住的那段經歷。當時戴高樂總統曾猛烈抨擊那些剛成立的歐洲共同市場迅速滲透的美國跨國公司。戴高樂以及西歐、加拿大和第三世界的其他民族主義者認為，這些跨國公司根本不是政治上中立的跨國行動主體，而是道道地地的美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代理商。雖然戴高樂聯合其他國家將跨國公司趕出共同市場的努力因西德(本書中所提之西德現今已與東德合併統一。——編者註)的拒不合作而付諸東流，但我認為，假如西德亦追隨戴高樂的民族主義領導，那麼，美國的跨國公司以及由它們所代表的跨國現象可能早已毀於一旦了。

我逐漸地得出了幾項一般性的結論：跨國公司的確反映了美國的經濟擴張主義，因而它不可能脫離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目標；美國與西歐之間在安全上的關連，為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擴張大開方便之門；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為這些經濟活動以及其他跨國活動提供了一種政治架構。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受到了卡爾(E. H. Carr)的著作(1951)的強烈影響。他對英國統治下的和平時期的自由貿易以及對當時英國勢力在傳播經濟自由主義方面所產生的作用進行分析，英國在十九世紀的經歷與美國二十世紀的經歷看來真的可以相提並論。儘管當時我並不完全贊同他的見解，但是，我又把研究焦點轉回到戰後美國學界不再關切的現實主義學派對政經關係的概念上，之後我幾乎將全部的精力投注在少有人問津的安全防禦問題的研究。

我以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係，分析美國與西德之間心照不宣的交易——美國為西德提供軍事防衛，而西德為美國在共同市場直接投資進行政治辯護，投桃報李——以及美國與日本之間類似的交易，我的看法遭到了一些與會代表的尖銳反駁。要知道，一九七〇年的美國正陷於越戰而無法自拔，誰把美國的外交政策及其海外經濟擴張連繫起來，誰就幾乎毫無疑問地會被視為馬克思

主義者。我當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我的確堅信經濟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提出某種代替舊觀念的新理論顯然是客觀形勢的需要，我從這一點出發，試圖闡明我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之間關係的理論。

最初，我對國際貿易、金融關係以及類似的概念所知甚少。在柯恩(Benjamin J. Cohen)和布藍森(William Branson)等傑出老師的指導下，我開始廣泛閱讀經濟學著作。亦選讀了一些早期政治經濟學著作，例如李斯特(Friedrich List)、維納(Jacob Viner)和康德利夫(J. B. Condliffe)的著作，並且研究當代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金德爾柏格(Charles Kindleberger)、弗農(Raymond Vernon)和其他學者的著作。由於伍德羅·威爾遜學院非常重視經濟學分析，所以它是我在這方面獨立進行刻苦鑽研的理想學府。雖然我覺得自己不同意我的經濟學同仁對政治及社會的許多看法，但我深切感謝他們不吝花費時間賜教，以及對我缺少具體經驗的寬容和耐心。

拙著《美國的實力與跨國公司》(*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1975)，就是我在這一時期為闡明我的思想觀點，以及為後來發展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這個領域而進行研究的第一個成果。在那本書中，我擴展了我早期論文中的論述，同時比較過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現實主義關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我認為，美國的跨國性海外擴展只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全球政治體系的脈絡中才能得到理解。我對美國的衰弱也表示了深切的關注，因為我和斯普勞特(Harold Sprout)交情頗深，而他對英國的衰弱有所創見。

我對列強（或者說霸權）的興衰以及這種看來有周期性發生的現象對於國際關係發展的意義越來越感興趣，由此，我寫了《戰爭與世界政治變化》(*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一書，除了一些老的問題之外，這本書著重於馬克思主義(或

稱準馬克思主義) (quasi-Marxist) 所言的依附理論(theory of dependency)。依附理論是六〇年代末期至七〇年代在美國學界興起的理論，主要是對越戰和低度開發的國家嚴重的關切和反映。儘管該書採納了依附理論的觀點，即世界結構是層級節制，並為強權所控制，但我認為（按照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論點）這種關係造成了權力根源的分散，並瓦解了霸權國家的基礎，從而必然導致一個新霸權體系的形成。因此，雖然那本書接受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體系理論，但其目的還是在於發展現實主義學派關於國際關係性質與動力的觀點。

本書收入了這些早期感興趣的論題，並力圖對它們加以更系統地闡述。政治經濟學的三種主要思想得到了更為詳盡的介紹，它們的長處與局限也得到了客觀的評價。本書雖然強調了自由主義重視市場效率的重要意義，但亦嚴肅對待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市場及資本主義經濟的批判。然而貫穿全書的重點則是現實主義或者經濟民族主義關於貿易、金融以及投資等關係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相應解釋的比較。對一些早期的論題，如經濟霸權、國際經濟動力以及長時期內經濟活動改造國際政治體系結構的趨勢等，本書也從一種全新的角度予以探討。

我早先對美國霸權的相對衰弱、對政治因素在決定國際經濟關係中有所作用，以及對經濟力量在改變全球政治關係中的動態特性潛心研究的成果在本書中再次有所體現，而其他內容則是初次發表。我強調日本的迅速崛起及其對自由世界經濟秩序的挑戰，並特別關切二十世紀末期世界經濟重心由大西洋地區向太平洋地區的明顯轉移，對西歐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變化及其逐漸放棄自由主義原則的意義給予評估。這些歷史性發展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可能具有的影響也是本書內容之一。本書預見了一種新的世界經濟，它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由美國霸權主義建立起來的那種世界經濟截然不同。

本書不想提出標新立異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或其他解釋，也不想包羅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新興領域內所有重要論題和論著。誠然，本書詳盡闡明並綜述了一些已經得到普遍接受的論題和解釋。但我尤感興趣的評估是目前對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兩者如何互動的論說。因為本書的重點是國際體系，所以對決定國家行動的主要國內因素的探討，就較為簡略。

本書基本上沒有涉及東西方經濟關係、國際移民以及如何運用經濟手段去實現政治目的方面的內容。因為我相信，東西方之間的薄弱聯繫（貿易、投資和金融）對國際政治經濟影響甚微，國際性人口流動的經濟意義已經減小，而有關經濟制裁和經濟福利的其他作用等業已在許多新著中得到了詳盡的考察。本書討論「正常」經濟活動——即金融關係、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問題的篇幅已經足夠。

在本書編寫過程中，我有幸得到許多幫助，藉此機會我願表示我的謝忱。首先，我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以及伍德羅·威爾遜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的慷慨支持，該大學的自由離職政策使我能放下手中的教學及其他工作而全力投入對本書的寫作。一九八四年秋，我在日本新瀉(Miyasato)國際大學任教，因而有機會瞭解這個迷人的國家。我非常感謝官里正玄(Chihiro Hosoya)和細谷千尋(Seigen Miyasato)兩位教授以及這所有趣並富於開拓精神的大學的同事和學生們。從日本歸來之後，在日美教育委員會富布賴特計畫和日本住友銀行的資助下，我的研究工作得以繼續。離開他們的幫助，這個似乎是沒完沒了的研究課題將是難以完成的。

普林斯頓大學的威廉·鮑恩(William Bowen)校長非常喜歡引用他的良師益友雅各布·凡納(Jacob Viner)稱讚該校的開放政策和倡導學術批評的價值時所說的話：「如果總是一個人閉門冥思苦想，誰知道他會想出什麼離奇古怪的東西來！」在此，我

願效仿賢哲對知識分子孤芳自賞的風格棄之若屣的鮮明態度，來感謝那些曾經閱讀並批評過本書的不同手稿，或曾經給予我其他幫助的人。考爾德(Kent Calder)、多伊爾(Michael Doyle)、高瓦(Joanne Gowa)、基奧恩(Robert Keohane)、科里(Atul Kohli)、米爾納(Helen Milner)、彼得森(M. J. Peterson)、斯皮羅(David Spiro)以及維爾金斯(Mira Wilkins)閱讀了部分或全部手稿，並對本書修訂工作提出了寶貴意義，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還將手稿中部分章節安排在他所辦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會上進行討論。我的研究助手多爾蒂(Elizabeth Doherty)和阿爾卡莫(Michael Alcamo)對我鼎力襄助，使我避免了無數謬誤。皮扎雷洛(Elizabeth Pizzarello)打印了文獻目錄，科伊爾(Sally Coyle)打印了索引。我的秘書杜布切克(Lenore Dubchek)、格羅內特(Dorothy Gronet)和施密特(Heidi Schmitt)在本書成文過程中也給予了許多幫助，在此亦一併表示感謝。最後，我要感謝格雷茨(Elizabeth Gretz)對本書手稿所做的出色的編輯工作。

連續三年的夏天，我都向我的妻子瓊許諾，要帶她去佛蒙特州一個最美麗的湖泊遊覽，洗去繁忙教學工作帶給她的勞累。可是一到了那裏，她就全力以赴投入了對本書手稿的整理工作，從清晨一直忙到深夜。她的編輯與文字潤色出類拔萃，她應得到的要遠遠超過一般作者給予他們妻子的那種慣例式的謝忱。沒有她的幫助，本書將不會問世。在事業和人生的道路上，她與我同甘共苦，不僅使我銘感肺腑，而且使我們更加伉儷情深。

羅伯特·吉爾平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譯者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國際關係的變化與發展，經濟和政治之間的相互聯繫及相互影響變得越來越密切了。但是，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政治和經濟仍彼此分離，各自孤立，許多重要的國際問題已經難以得到充分的闡明和圓滿的解釋。因此，在六〇年代，歐美就有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始對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和世界經濟中的政治因素，給予越來越多的注意，並且努力嘗試把國際政治學和世界經濟學結合起來，加強對國際關係的綜合研究，於是一門新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簡稱 IPE) 脫穎而出，到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已取得引人注目的發展。

著名的美國國際關係教授羅伯特·吉爾平正是這批開創先河的學者之一。吉爾平教授一九三〇年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伯靈頓。一九五二年畢業於佛蒙特大學，一九五四年在康乃爾大學獲碩士學位。一九六〇年在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柏克萊分校獲博士學位。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一九六一年起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國際關係。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及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任洛克斐勒基金研究員。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任美國總統的技術和經濟顧問團成員。主要著作有《美國科學家和核武器政策》(*American Scientists and Nuclear Weapons Policy*, 1962)、《科學家和國家政策的制訂》(*Scientists and National Policy Making*, 合著本, 1964)、《科學立國

時代的法律》(*France in the Age of the Scientific State*, 1968)、《美國的實力和跨國公司》(*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1975)、《戰爭和世界政治的變化》(*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貿易、投資和技術政策》(*Trade,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Policy*, 1982)等。他在七〇年代初就從政治和經濟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的視角來研究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曾發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政治問題〉(*The Politics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1972)、〈從歷史上看經濟的相互依存和國家安全〉(*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77)等論文，《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這本書則是他多年從事國際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與教學的新成果，是該領域中一本比較出色的綜合性著作。

誠如作者所說，這本書既是他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家之言，也是對該領域反覆探討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課題的一篇綜述。」所以本書前三章圍繞著國家與市場的關係，詳細介紹了「政治經濟學的性質」、政治經濟學中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思想觀點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動力」，為後面具體論述國際貨幣、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跨國公司、依附和經濟發展、國際經濟新秩序等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

這本書的最大特點，一是吉爾平博采政治經濟學三個學派之長，努力把理論、歷史和政策的分析融為一體，探討國際層次的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係。二是吉爾平十分推崇和著墨於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和基奧恩的「霸權後合作論」。他認為，「歷史經驗證明，沒有一個佔主宰地位的自由強國，國際經濟合作極難實現或維持，衝突將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雖然現在以美國為霸權為基礎的世界體系已大大削弱，但是美國「對未來體制的

確立仍是一言九鼎的」，所以，他假想未來的世界體系是在有美國霸權的情況下，通過大國政策協調來實現合作的或多邊的管理。不過吉爾平對此並不抱多大信心，他承認資本主義國家難以解決不平衡發展問題和避免衝突。他發人深省地指出，一種「以重商主義競爭、經濟地區(集團)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為特徵的混合體制」正在出現，但它的前景如何，「誰將獲益，誰將受損，或者它對全球繁榮與世界和平產生什麼結果，則還不清楚。」

吉爾平教授想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去考察世界範圍內國際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但政治和經濟兩者究竟如何結合，如何做為國際關係的整體進行分析，本書未能為讀者提供一個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不足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如此，本書深入淺出，涵蓋面廣，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的建設，作用仍是很大的。正因此，西方許多著名大學都把它做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首選教材，不少國家都把它列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翻譯出版。

雖然國際政治經濟學迄今只有二十多年歷史，但在羅伯特·吉爾平、蘇珊·本特藍奇、查爾斯·金德爾格伯格等一大批該學科帶頭人的積極推動和組織下，不僅使西方許多大學紛紛開設這門新學科，而且研究隊伍也已初具規模，從一九八五年起，美、英、德、法、丹麥、瑞士、日本等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專家聯合出版了《國際政治經濟學年鑑》，大批有關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論文和專著相繼問世，從而使這門學科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國際影響進一步擴大。我們希望，《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中譯本的出版，能有助於增進大家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瞭解和興趣，並對開展這門新學科的研究和討論，提供一些理論借鑑和資料基礎。

值此中譯本出版之際，我們對臺灣桂冠圖書公司熱情支持國外新學科的譯介工作，及時組織和落實翻譯出版事宜，表示衷心的感謝！由於能力所限，譯文中如有不妥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楊宇光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目 錄

序 言	i
譯者前言	vii
導 論	1
第一章 政治經濟學的性質	7
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11
市場的重要性	14
市場的經濟結果	18
市場作用和政治回應	22
結 論	24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三種意識形態	27
自由主義的觀點	29
民族主義的觀點	34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38
對三種意識形態的批判	46
對世界市場經濟的三大挑戰	60
在非福利國際資本主義世界上的福利資本主義	66
結 論	71

第三章 國際政治經濟的動力	75
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	76
結構變革的政治經濟學.....	90
結構變革的機制	102
結構變革與經濟衝突	123
結 論	127
第四章 國際貨幣問題	135
硬幣時代	137
政治貨幣時代	139
傳統的金本位制 (1870~1914 年)	140
英國領導權結束和美國領導權確立 之間的空位期(1914~1944 年)	145
布雷頓森林體系 (1944~1976 年)	149
美元和美國霸權	152
無體系的浮動匯率	161
政策協調問題	171
雷根政府和政策協調	174
政策協調的前景	180
結 論	188
第五章 國際貿易中的政治性	193
貿易的重要性	193
自由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195
民族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203
自由貿易與經濟保護主義	207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體系	215

緊迫的貿易問題	224
新的貿易格局	229
自由主義理論和民族主義理論的趨合	246
自由主義貿易體制的前景	249
結 論	254
第六章 跨國公司和國際生產	261
跨國公司的性質	262
美國跨國公司時代	268
跨國公司與母國	271
跨國公司和地主國	275
新跨國公司主義	282
結 論	291
第七章 依附問題和經濟發展	297
自由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觀點	299
古典馬克思主義對經濟發展的觀點	304
低度發展理論的觀點	307
對低度發展國家戰略的評估	325
不平衡發展過程	337
結 論	339
第八章 國際金融的政治經濟性	345
國際金融的三個時代	347
歐洲美元市場	354
八十年代的債務問題	357
日本對美國霸權的資助	368
日美聯合經濟及其前景	377

結 論	380
第九章 世界政治經濟的轉變	385
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變化	387
轉變問題	404
結 論	407
第十章 國際經濟新秩序	411
政治領導問題	412
調整問題	430
國際規則與國家自主	438
混合體制：重商主義競爭、經濟地區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	444
結 論	457
參考書目	463
索 引	491

導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經濟秩序發生了重大變化。以貿易自由、貨幣穩定以及全球之內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擴展為內容的「布雷頓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已不復存在。國際經濟關係的自由主義觀點從七〇年代中期以來逐漸遭到拋棄。而保護主義的蔓延、貨幣和金融市場的動盪以及位居主導的經濟強國在經濟政策上的分道揚鑣已經逐漸瓦解國際體系的基礎。儘管由於「慣性」，這股人類事務中的強大力量，已經把越來越不適用的自由經濟秩序的準則和制度，帶進了二十世紀的八〇年代，然而我們要問：這個體系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它的衰落對未來意味著什麼？本書試圖對諸如此類的問題進行有系統的說明。

本書是一項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計畫的部分理論成果。該研究計畫的主旨是將政治科學與經濟科學中各個學派的觀點結合起來去理解貿易、金融和經濟發展問題。人們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領域的關係割裂開來，孤立地分析政策問題，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二十世紀的一些重大變革，已促使國際關係學者將他們的研究重點放在經濟與政治之間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和持續的相互作用上。但願本書的研究能有助於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

爲了加深對當代世界各種力量的理解，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

經濟學進行綜合研究已成為當務之急。學術界這兩大學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向來存在分歧。現實世界的變革已使得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的緊密，我們不得不承認對兩者相互作用問題的理論闡述一直不夠充分，過於簡單，並且受到不同學派門戶之見的人為限制。

- 縱觀歷史，經濟因素向來在國際關係中有重要作用。經濟目標、資源以及外交政策手段，在各種政治集團的鬥爭中始終是舉足輕重的因素。即使在古希臘詩人荷馬時代，海倫的美貌——這或許一直曾是一個重要因素——也未必會使阿加曼門國王派船千艘大肆圍攻特洛伊城，希臘人的真正動機很可能是為了奪取並控制那條通過達達尼爾海峽的有利可圖的貿易通道。幾個世紀後的波斯帝國曾以其巨額黃金貯備來影響貧窮國家的外交政策，而公元五世紀雅典人對他們的敵手斯巴達的同盟國封閉提洛斯聯盟的所有港口，可謂是經濟鬥爭史上最早的一個記載。歷史上經濟因素影響國際事務的事例不勝枚舉。從這種意義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早就存在了。

儘管歷史上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相互影響一直存在，但在現代世界中的互動方式則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國家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一直隨著貿易、金融和技術的快速發展與傳播而有增無減。公衆也愈來愈認識到政治問題中包含著經濟成分，他們能夠（至少他們自認為能夠）比較容易地找出造成經濟得失的原因在於國內和國外某些集團的特別行動（Hauser, 1937, pp.10~12）。這種經濟思想以及政治民主思想的傳播導致了幾乎是全球一致的認識，即可以利用國家來影響經濟成果，尤其是依照有利於某些人的方式重新分配財富（Bonn, 1939, p.33）。因此現在人們把財富的分配、失業的災禍和通貨膨脹的蔓延都看成人類活動的後果，而不是某些不可抗拒的經濟規律的必然產物。這就意味著經濟問題必然趨向政治化。